



大会

第五十四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十二次全体会议

1999年9月24日,星期五,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古里拉布先生.....(纳米比亚)

上午10时05分开会

巴拿马共和国总统米雷娅·莫斯科索夫人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 大会现在听取巴拿马共和国总统讲话。

巴拿马共和国总统米雷娅·莫斯科索夫人在陪同下走进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荣幸地代表大会欢迎巴拿马共和国总统米雷娅·莫斯科索夫人来到联合国并请她上大会讲话。

莫斯科索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 主席先生,巴拿马代表团特别高兴地欢迎你当选为大会本届会议主席。我们高兴的是巴拿马人分享其进步愿望的崇高非洲人民在这个论坛上享有很好的代表性,因为你主持我们的审议工作,另一位杰出的非洲人科菲·安南先生领导秘书处。我们同大家一起祝贺你确认你的能力和技巧,并感谢秘书长对本组织的献身精神及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不懈努力。

对你的前任乌拉圭外交部长迪迪埃·奥佩蒂先生,我也愿感谢他出色地主持了我们的辩论并对大会审议工作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我还代表巴拿马政府与人民最热烈地祝贺基里巴斯、瑙鲁和汤加王国的代表,这些国家在本届会议第一天加入了联合国。这一事件毫无疑问地确认这个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及各国人民福祉的组织的普遍和包容

性质和目的。

今天我代表在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实现民族性的斗争历史中写下了光辉篇章的年轻、自豪的民族讲话。我是根据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的设计举行了本大陆新国家第一次大会的国家的发言人。

在大会面前,我代表其地理位置使之具有过境通道的特殊作用的国家,一个全心全意地服务于大洋间运输的国家,它因此不得不等到二十世纪结束时才恢复对其整个领土的统治。

我和我的同胞们一道,满怀激情地等待着这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的到来,这就是把巴拿马运河交到巴拿马人手中。在这个激起了如此巨大希望的重大事件前夕,我们必须赞扬许多巴拿马人作出的努力,他们自我们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以来就开始了一场民族主义斗争,要使我们摆脱1903年签署的最早的《运河条约》强加于我们的负担。他们的爱国主义行为在历史上以及在我国人民的传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自运河于1914年开通以来,它就一直是我们的民族的重要象征,是巴拿马人民作为一个民族实现发展的希望的中心。使我们成为世界桥梁和成为全球中心的运河在过去八十五年中促进了国际社会的经济进步。巴拿马人民现在将能够全面参与通洋水道产生的繁荣,因为在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巴拿马已决定运河不仅将准时运作为国际贸易服务,它还将促进可持续的人类发展。因此管理运河不仅是一种权利,并且是一种责任,使所有巴拿马人都有义务以负责任、有效和绝对正直

的方式管理这条水道。我们已加倍为此做好了准备。

运河的法律移交进程是在1977年随着签署《巴拿马运河条约》开始的。这项协定记载了美国关于在1999年12月31日把这条通洋水道的管理权和全部控制权移交给巴拿马的承诺。自那时以来,巴拿马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协调一致地共同努力使移交工作十分顺利。此外,特别是自1989年恢复宪政制度以来,我们巴拿马人商定必须把运河远远置于政治分歧之上。这种共识的成果是,在我国的政治《宪法》中写入了关于运河的一项条款,规定自1999年12月31日起如何管理这条水道。根据1994年通过的这项宪法规定,并在社会的广泛参与下,我们拟定了《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法案》,法案是在立法议会上一致通过的。

《宪法》条款和法案这两份法律文书提供了必要的法律机制,以确保通洋水道的适当运作。近年来,运河极其谨慎且高效率的运作,其航运及货运量空前,主要是由于几乎全部由巴拿马国民组成的宝贵人力资源。

为了保证运河今后的运作,巴拿马目前正在执行一项大规模的投资方案,大约耗资十亿巴波亚,以使这条通洋水道现代化和得到改进,并确保它能够应付需要和保持服务质量。我们希望这项现代化和改进方案将把运河的能力扩大20%。

运河管理局的一个优先事项是保护环境。《法案》规定,在1999年12月31日之前管理局将负有监督和观察运河流域,以及协调这个广阔区域自然资源的管理、养护和使用。

我谨感谢美国历届政府自1977年签署了《巴拿马条约》以来无可指责地执行了条约上的规定。多亏了他们,才可能克服在20年这样一个长时期内在移交通洋水道及转交在我们领土上建立的军事基地方面遇到的各种障碍。尽管双方政府仍有一些待解决的事项,例如划给美国军队用于军事目的某些地区的污染消除问题,但我国政府相信,目前继续存在的分歧将在合理的时期内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

把运河移交给巴拿马政府管理不仅对巴拿马和美国,并且对国际社会都是一件有深远意义的重要事件。因此,巴拿马人民希望国际社会的代表将参加与移交有关的纪念活动。巴拿马人民还希望自现在起巴拿马同美国之间的关系将建立在相互尊重、合作与公平贸易的基础上,因为自上一个世纪以来,强有力的历史、社会、政治和贸易联系把我们两个国家联接在一起。

对运河的控制和经济和政治地位方面给美国带来的好处应使美国珍惜美国领导人几十年来所说的兄弟情谊,并按此行事,以便开始一个与巴拿马的新的关系时期,使我们能够促进可持续人类发展,这是巴拿马人民十分向往的目标。

近几年来,我国同许多其它国家一样,因有人把一种经济理论强加于我们而深受其害,应用这种理论更多地着眼于主要的国际经济部门的利益,而不是各国人民的真正发展,根本没有考虑到作为我们国家基础的价值观念。正是这种现实状态使我国政府必须审查我国的经济政策方向,以便促进我国人民的发展。

我们对农村社区的发展特别关心。这些社区对我国的国力作出重要贡献。但它们也是在为确保自己生存而斗争方面遇到的最大困难的部门。我国政府的基本关切事项与提高最贫困者的生活质量联系在一起。这项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我们的努力,但也要靠我们为我国产品开辟新的市场以及在为我国争取更多的私人投资并与发达国家进行扩大合作。

在这个不断地重申妇女平等权利和妇女参与国家公共生活权利的时代,我自豪地成为巴拿马人民明白无误地对她表示信任、授权她作为总统为共和国服务的第一个巴拿马妇女。我把这种授权解释为是对我的挑战,要我根据半个多世纪来本组织以令人钦佩的坚韧精神一直维护着的普遍政治价值观念:政府的民主制度和对人权的尊重,诚实地和全心全意地促进人类发展。

因此,我肩负重任,要踏前人的脚印向前走——她们是在民主选举中当选的杰出领导人,诸如达·梅厄、英迪拉·甘地和科拉松·阿基诺及其他人;在西半球有欧亨尼娅·查尔斯、比奥莱塔·查摩罗和珍妮特·贾根。她们有助于实现这样一个愿望,即社会应认识到妇女的技能和优点,以便在平等的基础上分担领导国家的重大政治责任。

对巴拿马妇女来说,我代表着一个实现了的梦想。在这方面,我的当选是在我国以及在这个大陆其他地区确保妇女政治平等的运动中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然而,许多巴拿马妇女仍然受着贫困和匮乏的煎熬,她们与她们的孩子、老人和男子一道过着这种悲惨的生活,所谓的全球化没有考虑到这些人。

如果我们希望确保人类的生命能在这个上帝赐予的地球上持续存在,如果我们希望履行我们作为领导人

作出的承诺,我们就必须努力消除饥饿、贫困和匮乏,我国几乎三分之二的人民在这些痛苦中挣扎。

如果我们希望实现这些目标——这正是我们当选所应做的事——我们就必须根除腐化,腐化是阻碍我们取得我们各国社会期待我们取得的崇高成果的主要障碍。在这方面,我们高兴地向大会保证,巴拿马正在尽一切努力制止使用和贩卖毒品以及这种罪恶现象产生的洗钱行为。

我们各国领导人有机会采取各种措施,这些措施将十分有助于建立一个以民主、正义和自由的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更公正、更人道和更公平的世界,在整个历史上我国人民同世界所有各国人民一道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

我提请会员国的各位要人和代表坚定地展开消除贫困、匮乏和腐败的斗争,这些现象对人类生活条件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我谨请他们同我们一道拯救弱者、拯救那些遭受难以诉说的非正义的人们以及那些其生活方式受到他们既不能理解也无法控制的无形力量威胁的人们。

我在这里出席会议证明了巴拿马人坚信本组织建立的秩序,本组织早在五十多年前就开始为实现各国人民间的平等以及各国间的和平而斗争。这个组织全心全意地捍卫人权,在一切战线上反对歧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必须加强这个组织,因为联合国是能够听到小国声音的法院,是我们所有权利的最终捍卫者。

由于我国人民对联合国的信任,我谨请会员国的所有要人和代表同我们一道庆祝收复我们不甘愿失去的主权。在这个巴拿马人愿同全人类一道分享的历史时刻,全世界将响起欢乐的钟声,因为在这个论坛以及其他国际论坛上经常宣称的主权原则将在我国成为现实。

愿上帝,万权之源,指导大会的审议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巴拿马共和国总统刚才的讲话。

巴拿马共和国总统米雷娅·莫斯克索夫人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利昂内尔·费尔南德斯·雷纳先生的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将聆听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利昂内尔·费尔南德斯·雷纳先生在陪同下走入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欢迎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利昂内尔·费尔南德斯·雷纳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雷纳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能代表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在大会讲话感到特别荣幸,我并借此机会最热烈地祝贺你,主席先生,最近当选为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主席。

我还谨赞扬我们区域的杰出代表、乌拉圭外交部长迪迪埃·奥佩蒂先生所做的出色工作,他如此有效地指导了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的工作。

并请允许我祝愿科菲·安南先生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在执行其重要而微妙的任务中取得一切成功。

联合国这个易受损害的机构的崇高目标是保障各国间的和平以及保障各国人民不受到伤害,它是在半个世纪前建立的,为防止武装冲突、减少紧张、解决分歧、促进谈判与协议以及鼓励容忍和非暴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在以两种文明模式之间的两极对抗为特点的时代之后世界变得日益复杂,技术革命的高涨促使时间感加快、缩小了距离以及提高了期望,在这样一个世界上联合国必须继续发挥领导作用,以便应付这一系列的新情况,虽然这些新情况对世界各国人民来说代表着巨大机会,但也可能威胁他们的前途。

这不再只是防止战争和冲突的问题;人们将总是期待本组织执行这项不可避免的任务。联合国必须确保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过上有尊严的、有希望的和象样的生活。

过去世界从未积累过这样多的财富。人类在其历史上从未象今天这样能够在食物、衣服、住所、通讯和交通方面生产出他所需要的一切。今天的财富如此之多,以至于每天有一万亿以上美元只是为了投机目的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流通,产生了今天所谓的“赌场经济”。

为了使人们对这样数量的资本意味着什么有大概的了解,我必须指出,金融市场上仅一天的交易量就相当于所有非洲国家一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然而,这些财富集中于今天被称为中心国家的几个少数国家,在每一个这种国家里财富又集中在控制了工业、金融、交

通和通讯的少数人手里。少数国家里财富的集中以及这些国家对新闻媒介的影响,导致消费者哲学的传播,这种哲学反过来又促成有利于浪费、奢侈和摆阔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盛行。

然而,在有着所有这些财富的同时,世界却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贫困。今天,13亿人民生活在极度贫困中,其中大多数人每天都在挨饿。在这样一个富裕的世界上,30亿人靠一天不到两个美元生存,每年约有5千万儿童因为营养不良而受到永久性伤害。约有15亿人没有饮用水,20多亿人没有下水道和污水排水设施。很大一部分人获得的教育、保健和住房很有限,千百万人失业和没有可靠或永久性的收入。

在我们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时,这种惊人和可怕的贫富悬殊对世界所有国家和联合国系统是一种挑战。解决这种局势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只有靠所有国家,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本着休戚与共的精神和人类感同心地协力地为实现同一个目标而努力,全人类才有可能在平等和社会正义的基础上在这个时代共同创造出奇迹般的和前所未有的财富。

一段时间以来在各种各样的国际论坛上已提出了一系列全面兼顾的和合理的主张,如果这些主张得以实施,将有助于大量减轻贫困和创造机会。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曾通过一项决定,要把它们国内生产总值的0.7%用来资助一个方案,以期在2015年前把发展中国家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居民的百分比减少一半,世界十分高兴和满意地对这项决定表示欢迎。尽管这些国家做出了公开承诺,1997年促进发展的合作降到捐助国生产总值的0.22%,是自1950年代以来最低的数字。

在中心国家或高度发达国家每天进行1万亿美元的交易时,却出现了对最不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减少的趋势,这是不公平的。

发展中国家看到它们的外债从1993年的1万6千亿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2万5千亿美元。拉丁美洲的外债从1980年的447.86亿增加到1997年的6690亿美元——在17年中增加了将近15倍。利息支付额在1980年至1994年期间保持稳定,在240亿至280亿美元之间,但在1997年猛增到420亿美元。

目前的建议是只减少债务沉重的穷国的债务。在我们看来,这虽然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第一步,但并不够,因为它把包括多米尼加共和国在内一类国家排除在外,

这些国家为了实现进步与和平作出了巨大努力,但却面临克服不发达和贫困的艰苦斗争。

取消外债或至少减轻外债或取消利息将正确地确认这些国家尽管有着各种国内困难,却采取了严格的调整措施使它有可能认真地履行国际义务。取消外债或以任何其它方式减轻外债,将是真正作出旨在减轻贫困的国际团结一致的姿态。

此外,因此节省下来的资源将大大有利于债权国和国际商业银行界,因为穷国的购买力将增加,从而对国际经济产生新的动力。

所谓的亚洲危机产生了国际动乱,导致俄国危机,并对巴西经济产生了类似的影响,这又影响到南锥体国家的经济。在分析这场危机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认为,是亚洲股票市场上国际资金的流动所造成的一些因素引起了这场危机。由于出现了这种被确定为全球化经济的第一次重大危机的局势,这两个机构的经济学家都建议建立一种新的国际金融结构。这种新结构将谋求通过采用一整套仔细拟定的措施来稳定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防止今后再出现一场金融危机。

这些建议似乎是明智和有益的。但是,我们认为作为全球经济焦点的一种真正的新的国际金融结构应包括旨在采取减缓贫困措施的国际团结和合作因素。我们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每天有超过一万亿美元在国际金融交易中流通,但这些资源中没有一分钱进入世界上最贫穷的人的手中。只要用国际市场银行交易中仅仅是一分钟的价值,就能解决海地的所有问题。对于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甚至我们多米尼加共和国也可以说同样的话。

根除贫穷并非是一种虚幻的目标。有了目前在世界范围流通的财富,我们可以恢复每个人的尊严感。要确定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是本组织在二十一世纪面临的重大挑战。

为了迎接这一挑战,联合国本身必须经历一个变革和改革的进程,以接受所有会员国平等为开始,使拥有否决权的强国与在代表它们的本组织内被排挤边缘地位的穷国之间没有任何差别。毫无疑问,我们现在有着一种独特的机会来改革安全理事会。多米尼加共和国深信,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必须参照公平地域分配以及会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进行,因为如果改革导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歧视待遇,任何改革将是不可接受的。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多米尼加共和国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被选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尽管我国很小,但它有着和平主义的传统,它希望这种传统能够贯穿到指导安全理事会的基本原则之中并与其相结合。

多米尼加共和国自豪地介绍了第47/5号决议,大会根据该项决议宣布1999年为国际老年人年。由于老年人年行将结束,我们对它的国际成功感到特别骄傲。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由于政府的协调努力,我国国会于1998年9月通过了老年人权利法案,并设立了监测其执行情况的国家委员会。我们将此视为我国对老年人年最重要的贡献。

作为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提高妇女地位研训所)的东道国,我们再次希望强调该研训所十分重要的意义。该研训所是其总部设在发展中国家的仅有的三个联合国实体之一,而且是位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仅有的一个。现在它的重要性如同在1978年一样,当时它是为了促进提高妇女地位特别是我们发展中国家妇女地位而设立的。因此,我们吁请所有国家政府为重振该研训所作出贡献,使它能继续进行其重要的工作。

我们确信,在这一个期待国家间更加团结并有更公正、公平和人道的国际秩序的世界中,我们这一伟大的组织将更新自己,并将以有远见的领导身份采取行动,而这正是旧金山会议上的创始者创建它的目的。

我们希望在结束发言时吁请联合国各会员国参加并支持千年大会。我们相信,这一重要的大会将强调联合国系统鉴于全球化所造成的各种问题以及必须确保该进程将在二十一世纪有益于我们所有人而肩负的使命,以此重申我们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莱昂内尔·费尔南德斯·雷纳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塞内加尔外长雅克·博丹先生阁下发言。

雅克·博丹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在一致选举你担任第五十四届会议主席时,大会向你的国家姐妹的莫桑比克共和国表示了受之无愧的敬意,纳米比亚共和国在1989年11月在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

的主持下,组织了该国第一次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它标志着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及其总统萨姆·努乔马先生阁下的领导下,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合法的英勇斗争已经圆满结束。现在,在一系列愉快的事件之后,我们现在高兴地看到由你亲自代表的纳米比亚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本届会议上掌舵。我代表塞内加尔代表团向你表示我们最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祝贺你在你崇高的职位上圆满成功。

我还要表示我真诚和热情地祝贺你的前途迪迪埃·奥佩蒂部长以干练、专注和权威的方式指导了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的工作。

最后,在科菲·安南秘书长继续以他的干劲、智慧和远见,在特别困难的全球性背景下继续权威性地和顺利地执行其各项棘手的任务时,我希望再一次鼓励他。我感到必须要说的是,他当选为联合国秘书处的首长使非洲引以自豪,也使所有热爱和平与正义的国家感到满意。在秘书长访问塞内加尔期间,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阿卜杜·迪乌夫先生明确指出,塞内加尔政府保证并积极支持秘书长。

我真心愉快并极其高兴地欢迎代表基里巴提共和国、瑙鲁共和国和汤加王国的代表团和我们在一起,这些国家刚被接纳为伟大的联合国大家庭的正式成员。接纳它们成为会员国证明并支持了本组织的普遍性,因此有助于加强它的目标和宗旨。

请允许我使用普遍性的概念,解释,并在必要时提出正当的理由来说明,我国毫无保留地支持接纳有2200万居民的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的正式成员。中华民国是一个关心捍卫和促进人权的民主国家,是各国承认的世界经济大国,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该国通过商业代表团维持各种贸易关系,同我们一样对在《宪章》载明的和平、团结与合作的崇高理想有着坚定的信念。为了本组织的普遍性原则,该国应再一次享有它的地位。仅仅是公正就要求这样做,而我们的《宪章》所体现的理想还必须要求这样做。因为正是依据这些原则,其它一些国家已被接纳成为本组织的会员国,对此我表示欢迎。

我们大家一定都同意,第五十四届常会是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的事件。之所以有历史意义,是因为它是二十世纪倒数的第二次会议——或者说最后一次会议,这要看你如何地看待,而二十世纪是联合国在两次世界大会以及人类的其他重大灾难之后在其中建立起来的世纪,人们现在依然在感受到这些灾难的后果。

本世纪也是光明的世纪,人类在各种领域内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领域内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本届会议之所以有特别的政治重要意义,是因为它是在争取和平、国际安全、合作和促进人权等方面的一种不可取代的工具,而且是进行对话、反思和为即将到来的千年的各种重大挑战做好准备的一种及时的机会。

在即将进入第三个千年之际,我们应该在本组织的范围内,一起了解并思考我们应在即将到来的世纪中建立起什么样的和平、发展和团结。公认的事实是,现有的各种变化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内的各种影响是不能预见的,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要求联合国进行深化改革,并必须使本组织适应时代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目光明确、富有创造性和现实精神,并提出各种创新的范围广泛的建设性建议,而这些建议可转变成只是为了组成我们称之为人类大家庭的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的利益而采取的具体行动。

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的改革是对我们使这一重要机构现代化的决心的重大的考验,因为我们必须赋予这个机构以更高的透明度、更高度的民主、更大的权威和更高的合法性——简言之,更高的可信度。

人们已提出了很多建议,但在重组本系统的这一关键机关时,我们必须超越这些建议,表现出创造性和妥协的意愿,而考虑到的只是为人类服务的本组织的利益。从这一观点出发,非洲国家在《阿尔及尔宣言》中一致回顾了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哈拉雷宣言》中体现的各项合法要求。

但是,使联合国系统适应即将到来的世纪的迫切要求不应使与维持和促进世界和平有关的各种现有的紧迫需要黯然失色。本着这种精神,在国际社会纪念海牙和平会议 100 周年时,我希望说的是,我们多么欢迎在朝非洲和平的方向取得某些重大的进展。

我们赞扬由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和埃亚德马总统在塞拉利昂冲突方面的不懈努力,已于 1999 年 7 月 7 日在洛签署的《和平协议》。我们还赞扬,由于西非经共体在尼日利亚和多哥的主持下进行调解的结果,已签订了关于几内亚比绍冲突的《阿布贾和平协议》和附加议定书。塞内加尔坚决支持塞拉利昂和几内亚比绍两国政府努力建立和平,决心朝民族和解的方向前进,并在它们国家执行经济和社会复苏的政策。本着同样的精神,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各主要冲突方于去年 7 月 10 日在卢萨卡签署的《停火协定》是令人感到满意和怀有希望的另一个原因。

我还要提及洛克比事件,因为我希望这些国家的态度能提供获取成功结果的可能性。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我国表示最热切希望,正在西撒哈拉举行的公民投票将按照 1991 年通过的联合国解决方案的文字和精神,并根据休斯敦协议,在充分尊重西撒哈拉所有居民参加公民投票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情况下尽快完成。请允许我,而且我认为这是我这样做的合适的地方,向侯赛因二世国王王表示谦恭的悼念。

最后,我们希望在印度的协助并在印度尼西亚的合作下,东帝汶境内的局势将置于联合国的控制之下,以确保东帝汶人民的合法权利得到保证。

这些重大的突破不应使我们忽视安哥拉和索马里境内的局势以及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的冲突,在那里,尽管非统组织作出了值得称赞的努力,没有任何最终解决的认真迹象,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因为我们唯一的解救办法在于和平与和解。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在中东见到的逐步演变使我们有了希望的依据,这就是希望最终见到完全信任和有信心气氛,以及在尊重该区域各国人民权利的情况下,真诚地恢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以及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谈判。自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成立以来,我国就一直在主持该委员会的工作,因此我国重申它支持并声援兄弟的巴勒斯坦人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及其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主席,他们现在已为争取建立独立和主权的巴勒斯坦国进行了关个多世纪的斗争。

我们郑重重申,我们支持其目标为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伯利恒纪念耶稣诞生以来第二个千年的伯利恒 2000 年项目。

此外,以色列政府现在似乎要为和平而不懈努力。我们促请它继续走这条道路。这是符合该分区人民情况和回应困境的唯一办法。

在结束和平与安全这一话题之前,我要指出我国支持保护、捍卫和促进妇女和儿童权利的任何行动。它的法典已得到修改,以使这种选择和这些信念变成其本国的国内法。

现在我要谈谈和平的另一方面:发展合作。联合国在再次对它服务于世界各国人民的使命作出反应时,已在本十年各次重要会议期间为确定以协商一致意见为

基础的一套前后一致的方案提供了框架。这些方案继续鼓舞我们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作出共同努力。

但是,对行将结束的本世纪的各种现实进行认真的审查使我们注意到,成为进入第三个千年时人类标志的各种相互矛盾的趋势已损害了我们的成就。整个世界缺乏足够的持续增长,这意味着在今后的岁月中全球经济将面临极大风险。事实上,由于缺乏充分的增长,不发达国家与其周围地区之间的贸易紧张状况有加剧的危险。因此发展中的迟缓只会越发严重,从而扩大未受控制移民的人群。

此外,多年来一直在出现的差距变得日益明显。一方面,我们看到少数区域享有很高的生活水平或迅速发展。在这些国家中,贸易量、相互依赖程度和竞争能力的程度日益提高。另一方面则有一群国家——其数目更多而且人口也更多——,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很低而且停滞不前。它们大部分没有参与这一越来越紧的商业、金融和工业交流网络。它们难以为其产品找到市场,它们资本外流,而企业则避免建立在这些国家之中。

但是在过去四年期间,非洲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4.5%,从而使人均收入每年有所增加。由于这种进步首先要归功于内部调节的努力而不是归功于外部现象,所以这尤其值得称赞。但是,尽管有着这种宏观经济的成绩,大多数非洲国家仍然不具备基本的手段来确保今后的可持续发展,使它们能按照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规定的中期目标实现其减缓贫穷的各项目标,因为所需要的增长率约为每年8%。

诚然,非洲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速度缓慢,保护了大部分这些经济免受最近金融危机最剧烈冲击之害,但另一方面是,非洲无法充分利用全球化,而全球化可增加可供生产投资的资源。然而,发展中国家将不会也不可能逃脱全球化的各种影响。因此我们在此强调——特别是向各种倡议,诸如第二次非洲发展问题东京国际会议(第二次东京会议)、联合国/非洲论坛以及欧洲联盟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的各种谈判中的我们非洲伙伴们强调——必须鼓励已作出的各种努力,在消除全球经济中持续存在的僵化和不平衡方面更是如此。

在这方面或许值得重申一种承诺,这种承诺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之内联合在一起,并涉及认识到必须作出重大努力,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能保证在世界贸易增长中得到符合它们发展需求的份额。

但是此外,对乌拉圭回合建立的多边贸易制度原则执行方式的检查表明,承诺并没有得到遵守:许多障碍妨碍着通常是来自南方的特别是来自非洲国家的产品进入北方市场。关税壁垒、税率浮动提高、反倾销措施、以及动物和植物卫生措施,都是妨碍贸易和影响我们出口品——从而影响我们的贸易顺差——的行为和态度。因此我们冒昧地希望,今年11月的西雅图回合将在更大程度上不仅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关切立场,消除对它们根据公平和平等的原则充分参与世界贸易的障碍——特别是努力减少和消除上述障碍、法律和措施对贸易的限制性和扭曲影响——而且还将考虑到作为所有世界贸易中不可分割因素的社会权利和可持续发展。

鉴于非洲国家为得到其最近经济成绩水平而作出的重大努力,它们为了减缓贫穷而实现并保持其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8%的任务就资源而言将是非常艰苦的。我们要借此机会欢迎为非洲债务危机找到解决办法的新的国际气氛,特别是鉴于这一债务的总额——1998年估计为3500亿美元——为非洲出口收益的300%。

为此目的,八国集团中一些国家、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及联合国其他机关,以及布雷顿森林机构最近的一些研究提出建议,是一种新现实主义的迹象,这就是大部分债务无法偿还,债务是对非洲国家平衡增长的重大障碍,现有的债务解决机制,特别是负债沉重的穷国(多债国)倡议过于缓慢,太具选择性,并强加了太多的条件。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成员必须接受的设想是除其他外,以出售黄金储备的办法,大量增加用于多债国倡议的资源。

此外,尽管在捐助界内部有着减少援助额的压力,但要维持非洲的经济成绩以及该大陆对结构改革的承诺,只能依靠扩大而不能依靠紧缩:如果我们要实现基本的发展目标,增加发展援助至关重要。

最后,尽管我们各国进行了值得赞扬的执行经济和金融改革的努力,但直接外国投资流入量依然微不足道。

在强调目前全球经济形势的这些重大因素时,我远非希望避谈一个永恒的真理:可持续发展是每个国家本身的责任。国际社会必须找到一种更从全球角度解决债务问题的更明智的办法,不会减少非洲国家更好地管理其经济的必要性。

通过确定和执行高质量的宏观经济框架;通过极大地加紧促进国家勤俭节约努力以补充国际融资;通过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尊重国家法律、提高透明度、加强管制和责任,这种对债务的态度将成为现实。由于共和国总统阿卜杜·迪乌夫先生的领导和选择,我国支持这些基本原则,塞内加尔政府的政策是以这些原则为基础的。

我特别强调和平与发展问题,因为在我们所生活的大陆,和平时刻都受到不发达状态的威胁,而且由于没有和平,发展努力也没有保障。因此,必须努力巩固非洲和平,同时应该作出极大的努力,提高发展援助的质量和数量,以大幅度减少我们的债务,增加向我们大陆的生产性投资流入,如果说不能为非洲制定一个马歇尔计划,那么至少也应该为非洲发展制定一项融资计划。

我国代表团殷切希望,在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将有机会恢复促进发展的国际合作,以建立一个更加人道的世界。我深信,我们有这个资源,有这个智慧;我们还必须有做到这一点的政治决心。因此,为了加强相互作用,非洲已经同意促进经济一体化,并且更进一步,将建立一个非洲国家联盟。这正是在卡扎菲先生积极倡导下召开的第四次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特别首脑会议上通过的《西尔特宣言》的意义所在。

我深信,富国完全认识到它们的各种责任,而且它们将不会逃避自己的义务。上帝保佑,如果它们真的逃避义务,那么可怕的贫困将永远笼罩几乎全世界。我谨表示所有国家自愿表达的而且深刻地认同的真诚希望,这就是对任何人类的事物我们都不能无动于衷。因此,我深信,我们可以共同挽救人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长卡迈勒·哈拉齐先生阁下发言。

哈拉齐先生(以波斯语发言;由代表团提供翻译):主席先生,我真诚地祝贺你当选大会主席,你是当之无愧的,我谨向你保证,在你履行职责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将完全支持你并与你充分合作。我还谨感谢你的前任,他在任职期间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还谨表示,我国政府深深感激秘书长,他以绝伦的智慧和洞察力在促进联合国各项目标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即将结束的二十世纪是一个充满正反两方面宝贵经验的世纪。就正面而言,反对以武力作为政策工具已

成为国际行为基本原则;促进和保护人权作为普遍概念在世界议程上已获得优先地位;科学和技术领域的惊人进步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知识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以前被殖民化的国家获得力量,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独裁和专制受到全球要求参与的呼声的严重挑战;通讯领域的技术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人的互动方式。

在出现这些积极发展的同时,二十世纪也出现了各种消极现象和趋势。在国内和国际各级,专制心态仍然挥之不去;物质、精神和文化贫困依然存在;贫富差距扩大;世界从未停止过冲突和流血;过去的破坏性领土战争演变成悲剧性的民族、种族和宗教派别竞争;各种形式和各种表现的极端主义仍然存在,并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在世界各地,恐怖主义仍在向人类挑战,并且不断再现。

二十世纪的一个特征是全世界出现了个人和集体参与的要求,这是对世界任何角落专制主义和权威主义统治的挑战。决策不再是独裁者或甚至贵族的专有权利。决策已经成为一个参与性进程,需要集体贡献。各国和国际上的专制主义倾向和思想最终都认识到它们已经过时。

民主制度和人民参与在全世界兴起,成为稳定的唯一保障,成为善政的试金石,这确实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自决、集体参与和被统治者的同意是宝贵的和经过时间考验的合理的选择。

在本世纪,伊朗在争取独立、自由、正义、参与和善政方面经历了根本性变化。自古以来以及在伊朗整个动荡的历史上,伊朗一直是创造发明的中心。伊朗自豪地保护了其正在的民族和宗教传统,同时,根据其文化的最优秀传统,伊朗从未拒绝现代化、新思想和新方法。

在今日的伊斯兰共和国,在伊斯兰民主原则的坚实基础上,民主化进程正在向前发展。政府坚定地决心大力推动执行和巩固各项改革方案。这些改革政策的基础是促进和保护宪法规定的各项自由;维护法治;加强民主准则和机构;使参与文化体制化;提高人民在政府中的作用;政府官员充分负责任;提高透明度;加强民间社团机构;促进容忍和一个拥有多种声音的多元社会;国内趋势以及在对外关系中建立信任和打破旧的壁垒。

毫无疑问,顾名思义,开放、活跃和民主的社会容易出现不同意见,甚至出现竞争。历史上,在改革进程中都有这种现象,这是这个道路上不可避免的因素。哈特米

总统政府在解决这些社会和政治挑战方面采取的健全和成功的办法得到了领导阶层的充分支持,这个办法就是促进和保护基本民主价值观,保障法制和适当程序,以及保障安全与稳定,这些都是一个繁荣昌盛和开放社会的基础。

集体参与已经超越地方和国内决策过程,日益成为国际决策过程中必须有效地存在的一项全球性的要求,所有国家充分参与是一项必要的反应,然而这个并不够。它需要民间社团有效地参与全球决策进程的各个方面。

在本世纪内,排他性往往成为全球互动关系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世界被视为各种效忠模式,各国或属于某些联盟,或不属于某些联盟,并因此而被划分、得到回报或者被指责。今天,这种模式的价值日益受到严重怀疑,我们某些基本观点的有效性也受到严重怀疑。

冷战是排他性的最后一章。毫无疑问,冷战在国际事务中留下了负面影响,但更令人遗憾的是,冷战永久地影响了全球各角色的心态,影响了国际关系理论。

排他性最可怕的表现之一是全球军备竞赛。这种竞赛的目标就是通过累积常规和大规模毁灭性死亡武器、组成竞争性的军事集团以及毫无节制地竞相扩大势力范围和统治范围,使其他国家边缘化。

这种模式持续存在,这是对中东地区造成最严重威胁的主要原因。以色列利用这种全球互动模式,不受惩罚地践踏巴勒斯坦人民各项最基本权利、包括他们的自决权利,驱使数百万人大流亡,在叙利亚戈兰地区和黎巴嫩南部非法占领他国领土,甚至进行勒索,以换取部分地履行其义务。这阻碍了巴勒斯坦人民、事实上阻碍了整个伊斯兰世界在被占领土建立以圣城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合法权利。该政权还获得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拒绝世界不扩散制度,对区域和全球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产生暴力和排他性全球文化的部分原因是将暴力作为实现联盟各项目标的可接受的手段而合法化,这种文化无意中培养了从民族压迫到恐怖主义的各种全球性威胁。

阿富汗二十年的自相残杀和破坏是因为一个集团或一个民族幻想可以牺牲其他集团或民族的利益获得彻底的统治地位。这种幻想阻碍秘书长及其特使卜拉希米大使为通过建立有广泛基础的政府实现和平解决而作的建设性努力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因此,今天在阿

富汗,和平与稳定以及在塔利班控制地区对阿富汗妇女、男子和儿童最基本人权的尊重已基本成为遥远的梦想,富有光荣和丰富传统的阿富汗已成为毒品、恐怖主义和区域不稳定的渊藪。

请允许我谈论一下恐怖主义问题,恐怖主义已经成为一项严重威胁和全球性挑战。当然,恐怖主义使无辜的人成为受害者。但其真正的目标是法制、人民参与和文明社会的社会的各个体制机构。事实上,恐怖主义分子需要而且努力培养和强化暴力文化,作为其肥沃的土壤。正因此如此,由于伊朗人民和政府获得了国家共识,将法制和参与体制化,已知的恐怖主义集团极大地加强了对伊朗人民和政府的恐怖主义运动。更令人遗憾的是,他们仍然能够找到外国赞助者和庇护地。伊朗人民和政府毫不怀疑,这个危险的恐怖主义运动的目的是破坏我国反对一切形式暴力的决心,我们所有人都决心证明恐怖主义分子打错了算盘。

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坚定果断地携起手来,就可以而且必将遏止和消除恐怖主义。但我们必须认识到,采用双重标准严重破坏了这样一种全球行动。对任何倾向的恐怖主义分子给予默许都将阻挠成立一个统一、透明和没有歧视性世界机构,用以打击和铲除一切形式恐怖主义。伊朗一方面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一方面充分愿意积极参加这种全球性合作。

因此,今天有必要作出积极努力,使新的包容和对话模式建立在参与、容恕、谅解和集体合作的基础上。哈特米总统去年提出的各文明之间对话的倡议是一项提议,目的是摆脱排他和一方独尊的世界,并且以比较温和、比较文明的方法建设更美好世界,以此开始新的千年期。这个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热烈响应,2001年被指定为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这表明人类共同渴望在下个世界的相互关系中采取不同的方式。

我们认为,指定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不仅仅是认识到在全球一级进行对话这种不言自喻的必要性。事实上,这等于是宣布愿意尝试一种新的互动模式。这项提议的基本观点是,无视其他集团的贫困、饥饿、不发达状态和不安全状态或者甚至以这些状态为基础而实现一个集团的繁荣、幸福、发展和安全是自欺欺人的做法,是短视的,因此必须放弃这种做法。在某些领域,这项基本原则已得到普遍接受,而在许多其他领域,我们仍然有漫长和艰苦的路要走。

今天,已经没有任何人幻想可以从政治和地理上划分环境。消除麻醉品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问

题。我国伊朗对这一点认识特别清楚,因为在打击国际麻醉品走私方面,我们付出了沉重的生命、社会和财政代价。

在人权领域,国际社会似乎逐渐接受以建设性接触和谅解为基础的比较合作性的办法。在国际事务这个重要领域,多元主义、接受多样化以及各种文化和各文明之间进行对话无疑将加强各项人权文书的普遍性,使这些文书比较容易令人接受,容易在全世界执行。

对话是同时接受共同点和多样性的产物。从这个角度看,国际上赞成对话说明国际上认识到各文化和各文明的多样性,重申各国人民和各国家的文化权利,因此,任何人都可以从其自身文化、文明和历史背景角度与其他文明的成员进行接触,而不需仅仅附和一个完全陌生文化的心态。只有这样的互动才能彼此充实,才能真正具有意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坚信,承认和重申各国文化权利是促进持续对话的第一步。

在和平与安全领域,我们需要真正地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安全是全人类不可分割的需要和要求。因此,我们需要摆脱两极制度的残余思想,以新的、创造性的全球安全网概念代替集团安全伞,这个全球安全网是一个包容性和参与性的制度,这个制度以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竞争的方式利用现有各机制。

使民间社团可以积极参与全球裁军和安全论坛和辩论将极大地促进和加速实现这个目标。迄今为止,这种宝贵的作用基本上只局限于社会和人权领域,安全和裁军领域或多或少被剥夺了民间社团的贡献和见解。应该纠正这种缺陷。

与此同时,可以采取中短期措施,其中包括在区域和全球各级建立信任、裁军领域透明度、稳步减少军事支出、销毁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在此之前不扩散核武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自己就采取了这些措施,并将其外交政策建立在建立信任和排除旧障碍的基础上,其中尤其强调与近邻的关系。

我国是伊斯兰会议组织主席,我们在发展各种机制和工具以加强成员国间信任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并使与欧洲联盟等机构的对话和协调制度化。

在塑造下个千年期新世界方面,联合国具有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在下个千年期里,应维护和推广联合国的成就,重振联合国的道义权威和政治地位,这就要求恢复联合国的基本宗旨和原则,要求开展一个合理、透明和参与性的进程,以重新评估现有各机构。

提高联合国地位首先要求加强大会的作用,提高大会的效率,将其审议重点放在我们这个世界今日面临的当代各项挑战和问题上,使大会及时和有效地参与决策,以解决全球经济和政治问题,使大会可以根据《宪章》授权,认真审查联合国各机构、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报告,并有效地作出反应。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大会作为联合国唯一民主、普遍和透明的机构,是深入分析正在出现的、关于采取集体行动解决人道主义灾难问题的辩论所涉各种问题的适当论坛。在这项活动中,共同的出发点必须是维持《宪章》制度的完整。

我坚信,明年千年期首脑会议是否获得成功将取决于能否采取创造性办法,使联合国系统可以走向——而且领导国际社会走向——国际事务新模式。过时的方法和陈旧的措施未能解决困扰人类的各主要问题,有时甚至加重和加深这些问题。在集体寻求基本解决办法时,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摒弃陈旧的看法、思想和概念框架。这正是各文明之间对话的前提和主要目标。人类社会重大变革需要政治家和精英分子勇敢和无畏地发挥领导作用,对陈旧和无效的方法提出质疑,为思想家、知识分子和民间社团的参与打开门户,以寻求比较仁慈和比较温和的明天。我们希望我们的大会有这种无畏精神和远见。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面请古巴外交部长菲利普·佩雷斯·罗克先生阁下发言。

佩雷斯·罗克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今天聚集在这个大厅的有富国代表,也有占多数的穷国代表。有人均国内总产值达 25 000 美元国家的部长和大使,也有代表人均国内总产值仅为 300 美元的国家的部长和大使。而且,这个差距逐年扩大。

有些代表所代表的国家似乎前途光明,这些国家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 20%,却占世界国内总产值 86%,世界出口市场 82%,直接外国投资 68%,全球所有电话线的 74%。

我们所代表的各国家占世界人口 80%,几个世纪以来被殖民化,被掠夺,以增加前宗主国的财富,对于我们这些国家的前途,我们可以说些什么呢?不错,时代不同了,我们的历史已经发生,这并不是我们所希望发生的。但是,我们是否应该逆来顺受,接受一个基本上没有变化的未来呢?世界上三个最富裕的人所拥有的财富超过了有 6 亿人口的 48 个最不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这些国家的代表今天都坐在大会堂里,要求公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感到放心吗?

今天,在这一大会堂里,在我们中间一些代表的国家里,人口中的多数——而这一人口几乎没有增长——保证享有象样的生活水平,而有些人还过着富裕的生活。这些人口每年在香水上花费 120 亿美元,在宠物食品上花费 170 亿美元。

但是,在这一大会堂享有代表性的多数国家没有任何理由感到乐观。这一多数中,有 9 亿人在挨饿,13 亿人生活在贫困中。今天,在这里代表非洲的我的兄弟姐妹们没有理由感到放心。他们知道,今天,他们大陆上有 2 300 万人感染艾滋病毒,他们而且还知道,仅治疗一个感染上艾滋病毒的人就需要 12 000 美元,这也就是说,要使非洲所有艾滋病人接受如同富裕国家向艾滋病人提供的同样治疗,每年则需要将近 3 000 亿美元。

代表地球上 60 亿人口——而且每年增加 8 000 万,其中多数在第三世界——的各位同事是否能真正认为这种局面可以原封不动地持续到下一个世纪?

鉴于目前的世界秩序不允许穷国人民在自己国家找到过上象样生活的条件,我们怎么能够阻止越来越多的穷国移民涌入富国,以追求其梦想呢?

本大会堂里少数代表所代表的国家不用担心下一世纪会遭受军事威胁。有些甚至拥有核武器,参加了强大的军事联盟,或者每年以更加先进、更加尖端的武器来装备其军队。它们把世界其他地区看成只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欧洲-大西洋边缘地区,因此,它们绝不会遭受这一侵略性军事组织的所谓新战略概念下由隐形进攻者发动的狂轰滥炸。

但是,今天聚集在这里的我们当中大多数不能享有这种安全。使我们不安的是,在由仅仅一个军事及技术大国主宰的世界里,今天我们却比艰难的冷战岁月里感到更不安全。

如果我们有一天要呼吁安全理事会讨论我们认为是对某一穷国构成威胁的局势,大会认为我们的意见会得到听取吗?恐怕最近的事例证明并不是这样。

大会为什么不讨论全面彻底裁军,包括核裁军呢?为什么这一问题只限于控制小型武器,而小型武器对于古巴这样 40 年来一直遭受袭击和封锁的国家是必要的。为什么没有人提到美国对科索沃平民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了致命的激光导弹、贫化铀导弹、或者集束和石墨炸弹呢?如果我们不改变目前用来衡量对我们集体安全如此关键的重要问题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的标

准,我们怎么能声称我们的后代会继承一个公正而安全的世界呢?

我们是不是必须接受你死我活的野蛮商业竞争中实行自由市场的规则以及供求关系的神圣不可触犯的法则呢?国际社会为什么不能以理智与协调的方式力图将目前用于军事开支的 7 800 亿美元中很大一部分转用于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呢?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如此热情地捍卫对国际法原则的尊重,这些原则在半个多世纪里指导了世界所有国家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穷国再也不能依赖诸如尊重所有国家主权与自决权以及主权平等,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之类的原则,那我们今后还有什么可以维护呢?如果这些今天就已经有系统地而公然地遭到违反的原则从《联合国宪章》中勾销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呼吁国际社会来抗议对我们中的某一国家实行的危险?

在一极化世界里,企图强加诸如限制主权和人道主义干预等概念无助于国际安全:它们对第三世界的国家构成威胁,这些国家既没有强大的军队,也没有核武器。因此,必须结束这种企图:这种企图违背了《宪章》的文字与精神。

同时,我们认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必要捍卫联合国。我们捍卫其存在的必要性,同时也同样地捍卫使其民主化的必要性。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要改革联合国,使其平等地为所有国家的利益服务。我们捍卫安全理事会存在的必要性,同时也捍卫使其更加包容、民主和透明的必要性。为什么不增加常任理事国数目?安理会为什么不能纳入二、三个来自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新常任理事国?联合国成员现在是联合国于 1945 年在旧金山成立时成员国数目的三倍,而其中多数国家——第三世界国家——没有一个常任理事国来代表它们。

但是,我们不能维护否决权。我们认为,任何国家都不应当拥有否决权。但如果无法取消否决权,我们至少应当力图保证,这种特权能够更加公平地分享,并保证所有新的常任理事国都有否决权。如果现在无法取消否决权,那为什么不把这项权力局限于对按《宪章》第七章而提议的各项措施的表决?按目前的情况,只要一个国家就能够凌驾在联合国所有其他会员国的意志之上。而有一个国家已经无数次地行使了其不受制约的否决权:美国。这是没有理由的。

在联合国,我们必须制止将单一的思维方式强加于我们头上的企图,这企图使我们相信这就是我们自己的

方式,或者这比我们丰富多彩的文化与模式更为优越,认为这比我们多种特性更为先进与现代化。为了生存,我们必须抵制作为只是欧洲-大西洋边缘地带的待遇,并反对将我们由于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甚至由于最近或目前政策所造成的结果而面临的各种问题:如不发达、富国的消费主义称为全球威胁。

这个会议厅中现在有七国集团的代表,这些国家有6亿8千5百万居民,其经济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额为20万亿美元。这里还有我们其他国家,也就是其余的181个国家,这些国家共有50多亿居民,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额勉强达10万亿美元。虽然根据《联合国宪章》我们都是平等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却不是。

富有跨国公司,这些公司控制着世界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而我们穷国承受着令人窒息的外债负担。我们的外债已上升到2万亿美元,并且继续增加,仅仅是为了偿债就耗掉我们几乎25%的出口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发展呢?虽然我们在这个会议厅中坚持不断地谈到需要有一个新的国际金融结构,但我们的国家仍然在经受着现行制度之害,在这个制度下每天进行着价值3万亿美元的投机性交易。这是一个无法纠正的结构;需要的不是对它进行修正,而是需要摧毁和重建它。

有谁能解释这个幻影经济的逻辑吗?这个经济不生产任何东西,而是靠买卖并不存在的东西维持的。难道我们不应该摧毁这个混乱的金融体系并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一个促进生产的体系吗?新的体系应该考虑到各国之间的差异并停止强迫我们的受到打击的经济无休止地追求不可能实现的增加金融储备的幻想。这些储备早晚会在为在强大和受到过时的布雷顿森林协议所高度欣赏的货币,即神圣的美元面前维护我们的货币的无望和不公平的战斗中化为乌有。

在写这些年的历史时,将非常难以解释一个单一的国家如何能够聚积如此多的特权和如此绝对的权力。下一个世纪的经济学家们在认识到以下事实时会说什么呢:美国在二十世纪中保持着已经达到大约3000亿美元的来往帐户赤字,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却没有向它强加正在使第三世界的国家陷于更严重贫困的严苛的调整方案之一?

谁将能解释以下事实:由于他们所享有的拥有世界储备货币的特权,美国人比世界其他任何人都花费得多和节省得少?谁会告诉他们,美国人在1998年进口了价值1240亿美元的轿车,并在化妆品上面了80亿美元,

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控制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7.8%的投票权,从而使他们具有事实上的否决权?

例如,我们如何能向坦桑尼亚人解释,在发生以上情况的同时,他们用于偿还外债的资金相当于用于初级保健的资金的9倍,相当于用于初级教育的资金的4倍。

目前的国际经济体系不仅是非常不公正的,而且是绝对难以维持的。一个破坏环境的经济体系是无法维持的。今天的世界饮用水供应只有1970年时的60%,而今天地球上的人比当时多23亿。森林也在发生同样的情况。这个会堂中谁会认为,这种迅速发生的破坏能够无限地进行下去?

以富国的不合理的消费方式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是无法维持的,而这种消费方式通过新闻媒介出口到我们这些国家中。我们应该接受这样一点:通过利用我们已经取得的技术发展水平来开发现有资源,我们能够为地球上的所有人提供相当高的生活水平,只要我们能够合理和以团结精神来开发所有这些资源。

他们将如何解释,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国家成员——我现在以尊敬的态度对他们的代表发言——在履行他们1970年作出的至少将他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的0.7%用于官方发展援助方面如此落后,仅仅提供了它们所许诺的数额的不到三分之一?

我国代表团的一个成员是我国国民议会的代表和信奉基督教的人。我问他《圣经》会对这样一个不公正的经济秩序有何看法。他很快地以《圣经》中的一位先知的回答复说:

“祸哉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

“为要屈枉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理,以寡妇当作虏物,以孤儿当作掠物。

“到降罚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来临到,那时,你们怎样行呢,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呢?”(《圣经》以赛亚第十章:1-3节)

我知道,这个会堂中的很多人也有同样的关切,我还知道,几乎我们所有人都在问我们自己同样的问题。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可以避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那样变为美国及其盟国的领地吗?我们能够真正地使世界贸易组织成为我们所需要的民主和有透明度的机构,而不是在损害沉默的多数数的情况下将少数国家的强大利益强加于人吗?这个沉默的多数过

于分裂、思想过于混乱而又过于轻信,因而不能看到世界贸易的冷酷的和教条的自由化所存在的危险。他们会记得,依赖一种单一的农业产品或几种调料的出口来维持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绝大多数将会由于几个跨国公司的激烈竞争而被排斥在世界贸易之外并且被打垮吗?我们不应该考虑到这些现实并接受不发达国家的利益需要保护这一事实,即便这种保护仅仅是为了保障它们的生存吗?

如果我们穷国的专业人员到富国去寻求更好的机会,那我们怎么能够竞争呢;如果我们甚至不能保留我们的运动员,而不得不悲伤地看着他们在另一国家的国旗下参加比赛,我们怎么能够竞争呢?如果最发达的十个国家控制着在过去二十年中发行的专利权的百分之九十五,知识产权不仅没有得到开放,而且比以往更严加保护,我们这些贫穷国家怎么能够在经济上竞争呢?

通过互联网与我们贫穷国家谈论贸易几乎是一个笑话,因为我们知道百分之九十一的互联网使用者生活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成员国中。目前,在美国、瑞典和瑞士,每1000个人中有600多条电话线,而在柬埔寨、乍得和阿富汗,每千人中只有一个电话,我们能够看到这种局面的改变吗?

作为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面临的状况的这种悲惨描述的一部分,我必须谈谈我自己的国家。古巴的局势就是在强国和小国的关系中不应该做什么的一个生动例子,如果有这样的例子可言的话。

40多年来,我国人民遭受美国推行的野蛮敌对政策和各种各样的侵犯。该国高层当局已公开承认,这项政策的目的是破坏古巴人民自愿建立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恢复美国曾经对古巴拥有、但在1959年1月1日随着古巴革命的胜利而彻底丧失的新殖民统治权力。

正如已发生的事件、美国发言人的公开声明以及已经解密的美国家秘密文件表明,这项侵略政策是以各种手段推选的,它们包括从政治和外交措施,宣传运动、间谍活动和颠覆,以及鼓励叛逃和非法移民,到恐怖主义行径、破坏和生物战。这项政策还包括组织和武装团体、对我国领土进行空中和海上袭击;600多次阴谋暗杀我国革命领袖、用雇佣军进行的一次军事入侵、1962年10月发生的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核冲突的威胁;以及最后,对我国进行至今已经持续了40年的一场野蛮的商业和金融封锁和疯狂的经济战争。

且不谈对古巴的这场侵略的经济方面,让我只谈美国政府展开的具体的侵略和战争行径。最近,古巴各社

会组织代表古巴全体居民,对美国行政当局提出民事起诉,要求赔偿和补偿因美国发动的秘密阴谋和“肮脏的战争”而丧生的3478名古巴公民和另外因此而成为残废的2099幸存者的损失。该案要求应对这些人的损失和伤亡负责的美国政府赔偿总额1811亿美元,作为对那些显然无法弥补和无价的损失:美国丧心病狂地反古巴政策的受害者——5500多名古巴公民的生命和身体健康的一种最起码的象征性赔偿。

在一次审查这项起诉、向全国广播的公开和公众审判中已清楚地证明,美国政府对这场持续的侵略负有直接责任,而且对古巴不宣而战曾经是过去40年中连续9届美国政府推行的一项正式的国家政策。

美国政府的那些领导人、官员和工作人员将怎么对他们的子孙交代,他们的良心受到策划和执行这场反对古巴的“肮脏战争”的罪恶和造成数千古巴人死亡的责任的道德负担的沉重压力。

我们能让一种听任象这些由一主要大国有系统和公然犯下的丑恶行径完全不受惩罚的国际制度继续到下一世纪吗?

涉及我国对外贸易和金融关系的每一个方面的凶恶的经济封锁尤其值得注意。这种已经持续了40多年的封锁,在革命胜利前就已开始发展。1991年解密的一份美国秘密文件揭露,1958年12月23日,在一次由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参加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古巴局势,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断然指出:“我们必须防止卡斯特罗取得胜利”。

3天后,12月26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指示中央情报局,他不想让国家安全委员会知道反对古巴的秘密行动的具体细节。一切都必须严格保密。

6天后革命力量突然取得压倒性胜利,使他们没有时间阻止卡斯特罗取得胜利。美国对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场袭击发生于1959年1月1日,当时曾经抢劫了公共财库的人同对古巴人民犯下最严重的屠杀和践踏的人一起,逃往美国。

革命胜利后5个星期,已被革命政府任命接管古巴国家银行的经济学家费莉佩·帕罗斯——一个在美国政界著名和受到尊重的专业人士——于2月6日宣布,前政权已从支持古巴货币比索的黄金和美元储备中贪污或者拿走了4.20亿美元。此后,《纽约时报》证实了该报告中有关资金失窃的说法,这些资金是我国当时的唯一储备。

这笔偷来的巨额脏物最后放进了美国的银行。没有还给古巴一毛钱。国家银行立即要求提供一小笔资金,以应付这一非常严重的局势。但这一要求被拒绝。

1959年5月17日实施的《土地改革法》旨在向我国绝大多数营养不良的人民提供食物,为当时失业的大批人直接或间接地提供就业。该法实施时,在古巴还没有提出社会主义一词;但是它在美国引起非常激烈的反应,美国公司拥有古巴境内许多最好和最肥沃的土地。该法中规定,古巴愿意向土地所有者作出延期赔偿,按合理与可行的数目分期支付,但是美国政府立即要求迅速、有效和全部用现金赔偿。但公共财库中没有东西可以满足这项要求。

一个月之后,在6月24日,在国务院召开的一次讨论对古巴采取行动的各种选择的会议上提出了美国应该对这项法律立即采取非常强硬的立场,以及取得必要结果的最佳办法是通过经济压力的观点。已提议取消美国市场上的古巴蔗糖配额。根据一份解除机密的文件,这将造成制糖业急剧地直线下滑,引起范围广泛和更高的失业率;因此大量被迫失业的人将开始挨饿。在同一次会议上,国务卿赫脱明确地将这些提议称之为经济战措施。

在一份日期为1960年4月6日的备忘录里,国务院高级官员L.D.马罗里先生指出:

“离间内部支持的唯一可预见办法是通过基于经济和困难之上的觉醒和不满……应迅速采取每一种可能的手段削弱古巴的经济”。

他建议采取:

“……一种行动方针,以拒不向古巴提供提供金钱和供应的方式……尽可能地对其进行削弱,以此来减少货币和实际工资,引发饥饿和绝望,导致推翻政府。”

同年7月6日,美国通过了拟议中的措施之一:取消古巴的蔗糖配额。美国将不再从古巴购买一磅的糖。美国和古巴之间过去100多年里培育起来的市场——据此,古巴在本世纪前半叶,包括在美国变成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强大的国家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保证向美国及其同盟提供这一必不可少的食物产品——顷刻间化为乌有,对我国的就业和财富的主要来源给予残酷的一击,剥夺了用于获取确保我们人民物质生存所需的食物、医药、燃料和原材料的基本经费。

从那时起,接二连三地对古巴人民不断采取经济措施,直至形成绝对和全面的封锁,这种封锁是如此过分,竟不允许进口一片美国生产的阿斯匹林,或向美国出口一束古巴种植的花。

这种全面封锁在过去40年里持续加剧,不无讽刺意义的是,它在官方术语中竟以一个委婉和显然无伤大雅的词被称之为“禁运”。在我国历史上的最关键和最困难的时期——当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社会主义集团发生崩溃,从它们那里,我国可以获得抵御对一个距美国海岸仅90英里远的岛国发动的凶残经济战所能依靠的基本市场和供应来源——它们决定更为强硬地制裁古巴:怀着不折不扣的粗俗和令人厌恶投机心理,将封锁强化到了极点。

所谓的1992年《托利切利法》,除了那些严重影响古巴和世界其余地区之间的食物和其他商品海上运输的限制性措施以外,禁止美国设在第三国的子公司与古巴进行贸易。这终止了从这些国家进口食物和药品的价值7亿美元的商业交易。这种种族灭绝性的政策在《赫尔姆斯-伯顿法》出笼时达到了一个更为臭名昭著的顶点,它以法律确定了以往所有的行政性限制措施,扩大和强化封锁,并使其永久化。

继该法通过之后和以进一步强化对古巴人民的封锁为目的,美国国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众多修正案,它们变成冗长法案的时间是如此紧迫,以致于许多美国立法者竟没有时间通读这些修正案。与极右翼有着密切关系的古-美恐怖主义犯罪组织达到了其将行政命令性的封锁变成严酷和不可变更的立法的目的。种族灭绝由此被制度化。

美国世界卫生协会根据1997年的封锁对健康所产生的影响的研究报告得出结论:它违反了管辖人权标准的最基本的国际协定和公约,包括《联合国宪章》、《美洲国家组织宪章》、《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由包括美国在内的约165个国家作为缔约国的《日内瓦公约》要求允许战时为平民使用的医药供应品和食物的自由通过。美国和古巴并没有交战。这两个国家的政府甚至在哈瓦那和华盛顿保持着外交代表机构。但美国世界卫生协会却得出这样的结论:禁运措施是蓄意封锁古巴人民在和平时期获得食物和医药的渠道。

美国世界卫生协会在同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了其看法:美国对古巴实行禁运严重地损害了许多普通古巴公民的健康和营养,并得出结论:禁运严重加剧了古巴人的痛苦,甚至造成了死亡。

大会连续七年前后一致地通过关于必须停止美利坚合众国对古巴人民实行经济封锁的决议。对这种种族灭绝政策的谴责年复一年地明显增加：从1992年至1998年，反对该项封锁的古巴决议分别获得了59、88、101、117、137、143和157个国家的赞成票，而美国，包括其自己的票在内，仅分别获得了3、4、2、3、3、3和2个国家的投票支持。鉴于美国对这些大会决议所表示的绝对蔑视，古巴人民决定，除了在大会中进行斗争之外，诉诸他们有资格进行的法律程序，要求对就这种种族灭绝行为负有责任的人实行适当的制裁。

古巴的倡议是建立在坚实和不可辩驳的法律基础之上的。大会1948年12月9日通过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古巴共和国分别于1948年12月11日和1949年12月28日签署了该公约。该公约于1951年1月12日生效，现在已经为124个国家签署和批准。《公约》第二条规定：

“本公约所称危害种族系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

公约紧接着在丙项中除其他行为外，还列出了如下行为：

“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之生命”。

第三条规定，除其他行为外，下列行为应受惩罚：“甲 灭种... 丁 意图灭种；戊 共谋灭种”。公约在第四条中明确规定，

“凡犯灭种罪或有第三条所列行为之一者，无论其为依宪法负责之统治者、公务员或私人，均应惩治之”。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于1949年8月12日签署，美国和古巴两国政府都批准了该公约；该公约于1950年10月21日生效。目前总共有188个国家是该公约的缔约国。第二十三条规定：

“各缔约国对于纯为另一缔约国平民使用之医疗与医院供应品，或宗教礼拜所需物品之一切装运物资，均应许其自由通过，即使该另一缔约国为其敌国。对于供十五岁以下儿童、孕妇与产妇使用之主要食物、衣物及滋补剂之装运，亦应同样许其自由通过”。

该公约的第一项附加议定书在其题为“对平民居民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物体的保护”的第五十四条中具体、准确而明确地规定，

“一. 作为作战方法使平民陷入饥饿，是禁止的。

“二. 不论是什么动机，也不论是为了使平民饥饿、使其迁移、还是为了任何其他动机，基于使对平民居民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物体，如粮食、生产粮食的农业区、农作物、牲畜、饮水装置和饮水供应和灌溉工程，对平民居民失去供养价值的特定目的，而进行的攻击、毁坏、移动或使其失去效用，都是禁止的”。

1948年关于种族灭绝罪的公约第七条不容丝毫置疑地规定，

“凡被诉犯灭种罪或有第三条所列行为之一者，应交由行为发生地国家之主管法院审理之”。

该公约第三条戊项中同样准确地规定，灭绝种族行为的共谋也应受到惩罚。

鉴于这一情况，古巴共和国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在1999年9月13日声明：首先，根据大会1948年12月9日所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定义，美国政府对古巴实行的政治封锁是一种国际灭绝种族罪；第二，根据已提出的论点以及上述声明，它宣布古巴有权要求惩罚此类行为；第三，由于40年来对古巴人民实施的严重、有计划 and 持续不断的灭绝种族行为，同时依照国际标准、原则、协议和法律，古巴法院有权审判和惩罚有罪方，不论它们是否到庭；第四，灭绝种族罪行为和其它战争罪不受任何限制法规的约束；第五，有罪方甚至可被判处终身监禁；第六，刑事责任不免除侵略国对它可能造成的人和经济方面破坏提供物资补偿的责任；第七，它呼吁国际社会支持这场捍卫正义、生命权、和平和所有各国人民自由等最基本原则的斗争。

今天，在这个大会堂这里，有三名年轻的古巴人作为古巴代表团成员出席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他们代表我国的大学生、儿童和青少年。他们来到这里代表向有关法院起诉美国政府，要求它对成千上万人所遭受的破坏和伤害给予补偿和赔偿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还采取了法律行动，建议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作我刚才所述的声明。

今天与我们一道出席会议的还有古巴医药界的三位著名人士，他们是全国大会的代表，曾经在那个机构面

前就针对我国的医药封锁所导致的悲惨伤害作过证。另外还有三名基督教人士代表,他们深刻的道义、宗教和人类信仰导致他们支持在我国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声明,要求审判和惩罚有罪方。

这些人士准备在美国这里回答向他们提出的任何问题,或者与新闻界、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立法者、参议员甚至美国国会的任何委员会见面。我们不仅准备提出控诉,而且准备进行辩论,并证明支持这些控诉的事实。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面我请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卡西姆卓马特·托卡耶夫先生阁下发言。

托卡耶夫先生(哈萨克斯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祝贺你当选担任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主席这一要职。我们相信,在你干练的领导下,我们将能够成功处理我们议程上的项目。

另外,我还要表示我们赞赏你的前任迪迪埃·奥佩蒂先生对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的工作所作的重大贡献。

我们赞扬秘书长为应付联合国面对的前所未见的复杂挑战而作出的努力。

在第三个千年来临之际,正象本世纪初一样,国际社会必须着手解决战争与和平这类实质性问题。一方面,我们目睹的全球化进程引发了思想、资本、技术、商品和劳务在全世界源源奔涌的流动,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在哲学的意义上讲,人类朝着全新的生存层面迈出了一大步。

另一方面,世界继续因冲突而动荡,这些冲突有其错综复杂的根源,尽管全球技术和通讯不断发展。冲突的根源首先在于种族、民族和宗教不容忍。令人绝对无法接受的是,这一极其危险的病毒在当今世界许多地区迅速蔓延,引发了恐怖主义活动和血腥冲突。危险的是,受冲突影响的人民却从其他民族和宗教那里寻找问题的根源。如此一来,我们便面临着一种死亡与绝望大行其道的恶性循环。我们相信,文明社会如果汇集其资源,将最终有能力打破这一恶性循环,让人民相信无冲突生存的好处。谈到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对抗,我们完全有权利要求采取各种手段,包括军事手段,促成持久和平。

与此同时,不能忽略当今的世界秩序迫切要求人民采取可靠措施,确保其基础结构的各种要素之间的平衡。哈萨克斯坦与一些国家一样,相信在下一个世纪,世界应当是多极化的,不存在权力中心和分界线,对抗和摊

牌、干预别国内政和强加政策指令。合作与相互理解、民主与可持续发展将成为未来世界秩序的核心。

我们相信联合国仍然是独一无二的政府间机构,它决定了国际关系发展的积极趋势。哈萨克斯坦要求加强联合国,就其组成并就其议程的全面性而言,它是一个唯一的普遍性讲坛。只有联合国有权处理根本的和平与安全问题的。

南斯拉夫危机清楚显示了加强联合国权威的问题已经变得何等迫切。我们越来越相信,需要加强安全理事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使授权采取某些行动成为其特权。

由于许多冲突的性质,这一点成为极其艰巨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要想适应新的政治现实,安全理事会应在进入21世纪时,通过接纳新的常任理事会,首先是日本和德国,乃至代表世界不同地区的非常任理事国,得到更新和加强。

巩固不扩散各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际制度并对生产裂变材料实行有效控制仍然是我们实现全球安全与稳定政策的核心。

哈萨克斯坦为实现不扩散和结束核武器试验作出重大贡献。我们认为决定接纳哈萨克斯坦加入裁军会议是对我们在这方面行动的适当承认。放弃核武器和加入《不扩散条约》和《全面核禁试条约》成为我国的自然选择,因为核试验的有害后果曾对我国产生了极大影响。哈萨克斯坦大力提倡进一步巩固不扩散制度,支持在中亚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建议。

我国一贯呼吁在亚洲建立安全结构。众所周知,在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上,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先生倡议召开亚洲相互作用和建立信任措施会议。9月14日,在本届大会开幕之日,经过7年谈判和谈论后,在阿拉木图召开了会议的亚洲成员国首次外交部长会议。负责外交政策的政府官员签署了《亚洲相互作用和建立信任措施会议成员国之间关系的指导原则宣言》,其中申明亚洲国家对努力确保该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坚决承诺和诚意。

因此,历史上第一次,人们为亚洲安全体系奠定了法律基础。在国际社会努力加强国际安全的背景下,对这一事态发展的意义怎样估计也不会过分。我们在这里谈论的这个地区,居住了35亿以上的人民,在世界贸易中占40%。

我们感谢所有参与亚洲相互作用和建立信任措施会议进程的国家,它们对我们的行动给予了支持,并真诚

希望与我们携手合作,建立亚洲安全体系。我借此机会表达我们对秘书长安南的感谢,他对哈萨克斯坦的倡议给予了密切关注和支持。

近来的政治事态发展表明了建立亚洲安全体系的需要是何等迫切。我在这里指的是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恐怖主义份子死灰复燃以及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

从我们地区安全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最近召开的“上海五国”首脑会议的成果非常重要。与会者建立了某种信任机制,涉及到军事活动和减少边界地区军事活动的透明度、解决划界问题和定期交流关于军事活动的信息。五国首脑认为,多极化反映了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有助于国际局势的长期稳定。

哈萨克斯坦呼吁按照 6+2 公式,通过谈判进程在阿富汗建立持久和公正和平。与此同时,我们认为,阿富汗的和平进程应有所有当事国参加。为此原因,哈萨克斯坦支持就解决阿富汗冲突问题在吉尔吉斯斯坦的贝什凯克召开一次有代表性的国际会议的建议。

哈萨克斯坦高度赞赏联合国努力促进转型中经济融入世界经济。我国期待与联合国在咨询服务和技术援助问题上继续合作。我们坚定地奉行深化区域经济合作和为此目的积极利用联合国的能力的政策。我国对于我们同欧洲经济委员会和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合作制订和执行中亚经济特别方案感到满意。

我们支持恢复丝绸之路。从地理上说,哈萨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发挥着连接两个大陆的角色。在罗马帝国时代,罗马到上海之间的贸易线经过这一地区。丝绸之路的恢复将推动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

当前情况下的设想是通过建立能源跨洲运输系统和通讯这 3 个支柱恢复丝绸之路。这一项目的核心反映了全球、区域和地方的利益,那就是开发该地区的自然资源,首先是大型油田和天然气田。但是,人们必须知道,没有哈萨克斯坦的碳氢化合物资源,任何大型输油管道工程都不可能实现。

鉴于世界能源运输市场竞争加剧,哈萨克斯坦高度重视输油和输气管道的建设。计划于 2001 年建成的北里海输油管财团项目是我国的一项优先考虑,因为该管道投入生产后,哈萨克斯坦至少能够使石油生产和向国外市场的出口增加一倍。

我们对开发里海架碳氢化合物寄予很大的希望。为此,我们认为,该海的法律地位问题极为重要。哈萨克

斯坦赞赏同俄罗斯根据修改后的中线达成里海北部海床划界这一突破性协议。

生态灾区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和重建在本世纪末已变得越来越紧迫,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哈萨克斯坦对于动员国际社会解决环境问题感兴趣,因为哈萨克斯坦本身有灾区,例如前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濒临死亡的咸海和其他地区。我国遭受荒漠化和洪水的危害,还直接受到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政府对有关国家支持克服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严重的社会、生态和人道主义问题的努力表示深深的感谢。大会通过的两次关于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人类与生态重建和经济发问题国际合作与协调的决议,无疑增进了对尚未解决问题关注的思考。

我们还感谢日本政府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倡议于 9 月初在东京举行的国际会议。这一有代表性论坛的结果在我国引起很大反响。我们认为这次会议是日本政府和开发计划署对执行大会有关决议作出的实际贡献。在这方面,我要借此机会对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以及作为会议共同发起的捐赠国所做的重要工作表示赞赏。

哈萨克斯坦正在采取具体步骤使社会民主化和加深政治改革。哈萨克斯坦国家元首提出了一项涉及选举、政党、议会、司法制度、妇女地位和大众媒介等重要领域的方案,今年早些时候,哈萨克斯坦举行了第一次公开的总统竞选。

选举进程的改善工作还在继续。已修改选举法以反映欧洲合作与安全组织的建议。选举法的规定将在定于今年 10 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加以运用。选举进程已变得比较有代表性,以便鼓励候选人和选民的积极参加。正在制订地方和区域政府举行选举的分阶段过渡方案。作为民间社会重要一部分的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得到了提高。司法制度和大众媒介正在稳步地变得越来越独立。

实现一个拥有市场经济的开放社会是哈萨克斯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我国民主化进程的势头在增加,已经不可逆转。

在政治改革的同时,哈萨克斯坦正在采取有力行动保护外来投资者的长远利益。我们的目标是确保——通过在我国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使哈萨克斯坦加入今天的世界经济体制。

哈萨克斯坦支持秘书长通过改革联合国以提高效益和能力来胜任对付出现的问题和挑战的努力。我们认为,联合国更新的具体成果只能通过所有会员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正因为如此,各会员国应该继续进行一致努力,加强联合国在促进下个世纪的全球稳定与安全方面的作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新加坡外长顺穆加姆·贾亚库马尔先生阁下发言。

贾亚库马尔(新加坡)(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最热烈地祝贺你的当选。在我们进入新的千年之际,联合国正在跨越一个重要的起点,我们需要一个老练的人指导我们的工作。你长期的联合国经验,起初是自由战士,现在是纳米比亚外长,对我们非常有利。

我还要感谢你的尊敬的前任,乌拉圭的迪迪埃·奥佩蒂先生去年的杰出工作。

同样作为一个小国,新加坡也希望热烈欢迎三个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基里巴斯、瑙鲁和汤加。我们希望它们也加入小国论坛。

我希望提出这一问题:联合国在二十一世纪能否生存下去?我带有挑衅性地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认为联合国尚未充分理解它在发展下一阶段所面临的中心挑战。除非它理解这一点,否则我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口头上的。

副主席美欧尔松先生主持会议。

当然,联合国几年来一直忙于改革工作。但所需要的是必须超越修正现有的体制或组织结构。问题不仅是使大会、安全理事会、秘书处和其他机关更有效地工作,尽管这也很重要。但我们如果忽视了这种努力的更广泛背景,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关键问题是目前的联合国在概念和组织上是否合理。

本世纪在国际组织方面的经历,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一个简单但来之不易的教训是联合国必须在国家体制的框架内发挥作用。如果说联合国比国际联盟发挥了更好的作用或存在得更长久,这是因为联合国适应了国家体制而不是对其构成直接的威胁。联合国会员国认为联合国是另一个保护伞,而不是一个贬低其作用的机构。

国际联盟的盟约依据的是不同的前提。它强调联军。它促进集体安全。它要求各国将争端提交仲裁和司法解决。国际联盟这样做,是对国家权利提出了明确

的挑战。另一方面,联合国却不能采取其会员国没有明确允许其采取的行动。我们的宪章明确表明,联合国所依据的是其会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它还强调伴随而来的不干涉国内事务的原则。

但是这些前提现在却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时,国家体制处于巨大转变的边缘。这将对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产生深刻的影响。

我并不是在预告民主国家的终结。主权的概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但主权国家似乎并不可能就这样消失了。无论目前的形势可能变得多么不适当或者无效,对组织国际政治生活尚未出现任何可行的替代办法。调整国家体系框架的激进提议不可避免将令人失望。因此,联合国必须在现有框架内发挥作用,即便这一框架正在发生变化。这里存在新挑战的细微之处和困难。

两方面的力量正在推动变化:一个真正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的压力和冷战的结束。两方面的力量都没有得到人们充分的理解;而其之间的相互作用则更没有为人们所理解。这一辩证逻辑既迫使国际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时又使国际合作变得更加难以实现。

世界上总存在一些需要各国合作的问题。相互依存并不是新事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象国家体制一样古老。当然,需要国际合作行动的跨国问题,其数目和规模现在都扩大了,但这只是程度的变化,而不是种类的变化。全球化不仅仅是更大程度的相互依存。

尽管全球化的影响在金融和经济方面最为明显,它对一系列问题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它影响了人们现在所理解的国家政府的概念本身。

任何国家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在其边界内向其公民提供公共货物和服务。但是在全球化经济中,国家的边界已不再象独立自主的经济单位那样有足够的领土来发挥作用。金融地理和经济地理与政治地理不再符合。这一不符合意味着,政府在其自己国家的疆界内不再拥有垄断的合法权利。这没有质疑国家法律上的主权,但深刻地改变了每个国家政府事实上的治理能力。

与过去的整个历史不同,挑战不仅仅是一国绕过另一国的主权,强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弱国。真正的挑战现在是在每一国家内部,不论它是多么强大。

处理这一现象提出了另一种不同的挑战,它不再是仅仅坚持主权的法律概念,或说服各国政府合作解决具体的问题。它迫使人们对政府和国家这一思想本身进

行新的概念制定。它要求强国和弱国都彻底改变精神状态。要实现这一点将很困难也很痛苦。

需要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国际合作,不仅仅是整个历史上出现的以各国利益组合为基础的合作。它要求对“国家”和“利益”两者的内容进行重新定义。国家之间的冲突或合作不再仅仅是在其主权的边界。它要求的是对治理和积聚主权共同承担责任。

为建设这种新的国际合作并使其扎下根来,必须用实际经验来支持合作的必要性,以表明它高于其他政治选择。就是在此,全球化和冷战后国际秩序的相互交汇和相互作用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冷战的结束最初似乎为联合国预示了新的黎明,为不受意识形态的冲突制约的国际合作开辟了巨大的可能性。但是这些希望现在都被撞得粉碎。在现实中,冷战的结束似乎使得更不可能进行国际合作。

自相矛盾的是,伴随世界经济更大程度一体化的是日益增加政治分裂。冷战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地缘政治斗争;冷战提出了超越民族主义的特性。甚至那些寻求逃避冷战的国家事实上也根据与冷战的关系对自己作出界定。不论我们站在哪一边,冷战都是采取国际行动的组织原则和我们据此理解全球事件的观念。

对那些因全球化压力而迷失方向的人,冷战的结束为其在实际或想象中的民族主义中寻求安慰和新的特性提供了机会。结果造成的国家的剧增和国际行动缺少明确的组织原则,已使合作成为问题。

意识形态冲突的结束和市场原则在生活所有领域不断增加的影响,正在使得经济效率成为评估政治行动的重要条件。但全球化同时侵蚀了各国为采取这类行动聚积其本国公民政治共识的能力。因此,尚未出现适当种类的新反应并不令人吃惊。

当然,正在口头上对需要新的国际机构来处理新的跨国问题,或对包括联合国在内的现有国际机构的改革说一些空话。但对国家疆界的经济地理和政治地理之间的不协调,更通常的反应是为其辩护或无结果的得意洋洋:新的保护主义、恐外或怀旧的民族主义、或当一个国家感到强大和自信时,这是一种新的治外法权,使人想起十九世纪。强国试图使其国内法律超越其边界,或坚持认为其标准是贸易和其他种类合作性互动的前提。

承认问题的全球性和几乎普遍接受市场至多只是表面上的国际协商一致。真正的回应,最具体和实际的回应,一直是区域性的,而非普遍性的。

这一进程通过欧洲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欧洲和北美洲发展的最快,在拉丁美洲和亚洲通过南堆体共同市场、亚太经济合作理事会和东南亚国家联盟自由贸易区,发展得较慢。正在探讨区域间初步联系。非洲一直只是在外围参与,但是指望区域主义在全球化的世界上不仅是个应景性办法会造成潜在的不稳定情况。如果无控制地推广到21世纪,这终将影响战争与和平这个基本问题。整个大陆边缘化显然是无法接受的。

因此,对全球治理分担责任的真正普遍办法,集中各国主权来处理全球问题要求就什么才合理地符合仍然拥有主权的国家的总的利益达成国际协商一致。无论这一事项或问题多么急待解决,它并非不言自喻。

一个具体国家或民族的正当公众利益的定义是长期历史进程、文化特性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产物。这是大多数国家中的大多数政治竞争的基本内容。在国内不容易达成协商一致。在因全球化和冷战结束而既团结又分裂的国际体系中肯定更难达成协议。

国际问题因冷战后国际体系多极的期望未实现而复杂化。多极世界目前更多地是一种潜力,而不是眼下的现实。这使人们感到不安。

科索沃战争集中了这种感情。它残酷地突显了已存在一段时间的趋势:应限制绝对的国家主权,要求遵守公认的行为准则和尊重人权。

这不是一个很新的概念,不干预国内事务的传统做法在实践上从未象在理论上那样绝对。人道主义干预学说可追溯到十九世纪,当时强国声称有权干预弱国事务。科索沃战争引起这种历史回忆,使人们更加不安。

事实上主权现在与与有关个人权利的另一国际法趋势不融洽地共存。这些趋势尚未协调。但这两种趋势都是事实主观愿望无法使其消失。总之,其逻辑相符性不是问题所在。尽管有科索沃,多数国家几乎不必太担心,如果它们善待公民的话。许多国家虐待公民,但没有人建议实行任何比道义上的责难更严厉的制裁。人权关切一贯是有选择的。

更重要的问题是相关但不同的。因全球化使经济和政治地理不搭配而失去领土参照点,冷战结束后战略意义消失已经使多数国际反应具有特定性。

我们从一个危机走向另一个危机,没有明确的方向感或连贯性。为什么是科索沃或东帝汶,而不是非洲?每个地方的人权不都是普遍的吗?冲突许许多多,如何选择什么时候进行干预?秘书长今年在大会讲话时向我们提出了几个经过深思的挑战:“《宪章》不排除承认有超越边界的权利”。《宪章》说的是,除了捍卫共同利益以外,不得使用武力。秘书长随后问到,什么是共同利益?谁将界定共同利益?谁将捍卫共同利益?在谁的授权下?用什么干预手段?

我同意秘书长的看法,即应回答这些问题并确定标准。迫切需要这种干预的规则和客观标准。不这样做将滋生不确定和不稳定情况。如果要在主权和其他观念之间建立新的平衡,那么应在心明眼亮的情况下这么做。否则就是尽管用心良好,但却一步一步地采取应景的解决办法。

如果联合国要在下个世纪仍有意义,这便是对国际社会的重大挑战。因为我们会面临更多进退两难的困境:如何协调国家主权和进行国际干预以纠正侵犯人权。

我们都熟悉国际媒体和非政府行动者的压力。这是现实,但不提供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在政治上无法接受的是,国际和平与稳定问题的决策是应景性的。更无法接受的是,有关以和平模式加强国际合作的共识只反映少数国家的关切。

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使发达经济中的多元社会仍能采取集体行动的条件。任何国家政府不能只靠胁迫统治,或者仅仅因其掌握最高权力而进行合法领导。使用胁迫或赤裸裸的权力常常被视为治理失败的表现,而不是治理的特点。

因此,在国际舞台上需要的是在国内已被接受的——可以说是以民主的名义坚持的东西:适度接受多样化的现实,细致地理解朋友、善意批评和真诚分歧之间的区别。说服那些因全球化和快速技术变化而迷失方向的人需要耐心和巧妙地平衡相互竞争的利益时具有熟练的外交技巧。

尽管联合国在不利条件下挣扎,有许多不完美之处,但它在存在的头40年中在一些重大世界问题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缓解了非殖民化的痛苦,它提供了净化场所来渲泄最危险的冷战情绪。它为超级大国提供了从无谓的对抗中后退的手段,而又不给任何一方带来严重政治代价。它有时在世界维持和平行动中获得显

著成功。同时,联合国通过专门机构为其多数会员国继续发挥重要的发展作用。

但是,联合国过去十年的经历并不令人欣慰。联合国在我已经试图描述的21世纪末重大事态发展中最多发挥了微不足道的作用。联合国日益脱离其无法摆脱的国际现实的危险。

同所有主权国家组织一样,联合国只能为其会员提供一个机制,用于它们的协议或分歧所决定的目的。但联合国不能只是少数国家的工具,不能成为各国不愿意或不知道如何对付的问题的存放处,或方便的替罪羊。严峻有事实是,这些是联合国近年来被迫发挥的作用。它不能继续走这条路,否则会受永久损害。

我认为,在这个世纪中建立了国际组织的趋势,建立了超越国家主权的国家间和国际制度间关系的更预见格局的趋势。这已不可逆转。不管我们是否喜欢,世界变得十分复杂,只能以多边办法处理。

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特定的国际机构在下个世纪组织国际生活方面必将发挥有效的作用。联合国无法假定它只坚持1945年设想的结构和进程便可完整无缺地生存下来。自那时起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将继续发生巨大变化。联合国没有选择,只能相应改变。

这一必要性是很清楚的。不清楚的是联合国应当怎样改革。所以我提出的问题要比我提供的答案多。讨论进程必须现在开始。讨论的机制掌握在我们手里。使用这一机制的责任也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否及时地承担起这一责任,使联合国有所改变也是我们的抉择。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时间。我只知道剩余的时间是有限的。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伊拉克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赛义德·萨哈夫先生阁下发言。

萨哈夫先生(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主席。我完全相信,你的经验与能力将有助于这次会议的成功。

随着冷战的结束,人们感到世界会看到平衡的国际关系,其特点将是和平、稳定与互利。但是实际情况证明并非如此。国际不平衡依然存在,而且正被用来将霸权主义的逻辑放在首位,从而使它在全世界及其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里长存。

由于这一局面,世界发生了一系列深刻而迅速发展的变化,导致许多地区发生政治和军事冲突,对世界许多

地区的人类、经济和社会条件造成了危险的后果。这些冲突夺去了几十万无辜平民的生命,并且造成了物质和人类资源的大量浪费。

世界将以这种方式进入新世纪。我们面前的景象表明了强权霸道,强加霸权主义,以及日益恶化的经济问题。南方各国越来越被排挤到国际社会边缘,致使其存在及生存因素也将被消除。这将导致经济上的从属地位,从而不可避免地引起政治上的从属地位。在这一方面,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就是实行形形色色的禁运和经济制裁,阻止发展并剥夺各国行使其庄严载入国际法与各项公约的经济权。这种不平衡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反映在世界上许多地区的社会状况中。这些影响表现在贫穷状况加剧,文盲现象普遍化,健康状况恶化以及生活水平下降。它还反映在社会中许多社会阶层,特别是青年由于缺少就业机会而产生的边缘化;同样,犯罪率上升和毒品泛滥,以及难以控制的其他严重社会问题。

众所周知,这一局势恶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出于政治目的对世界上许多国家任意实行全面制裁与禁运,这种制裁和禁运并无任何适当的国际法基础。显然,这种政策对目标国家以及第三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造成了可悲的影响。这构成了对《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以及对公正原则的公然违反。

在本十年出现的最危险的现象在本届会议中由于西方国家集团的操纵成为一种活动,那就是宣扬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这种理论在国际法中站不住脚,其根源在于有组织地侵犯目前国际秩序的最根本的规则,例如主权、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与不干涉内政。这些原则无法为严重侵犯人权或为有时使用武力进行干预以便保护上述权利提供挡箭牌。谁也不应当受到这种理论的蒙骗,因为它是以强权政治为基础的现代形式的新殖民主义的新结构。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被用来为这种理论辩护的任何情况都未能避免外来政治干预,而这种干预首先就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始因素。因此,不当声称对这种局面的国际责任完全在于目标国家政府。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以及联合国组织的机制并不缺少处理提出来为这种理论辩护的局势的各种模式。

问题不在于原则、规则和程序。问题在于控制国的自私和单方面的政策。使用反映联合国会员国的共同意志和集体利益的,为正确实施《宪章》的原则和规则而建立和联合国机制不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

伊拉克并非不熟悉这种西方理论的逻辑。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很早就提醒人们注意国际关系中的强权和机会主义政策的危险,这种政策的执行损害《宪章》和国际法中反映的权利和义务与共同责任之间的平衡。

在联合国不得不在国际关系中顺从控制国的意见和他们的私利时,认为联合国的作用已经变得非常次要时是没有道理的。无论《宪章》的权利、义务和程序方面有什么规定,我们深信,自以为是为了人道主义目的的干预理论是一个危险的破坏性工具,它损害了为普遍的国际利益而作出的联合努力的成果,这种成果反映在本组织的记录中。这种理论概念的普遍流行将意味着完全否认绝大多数国家的意志,其结果是破坏目前的国际秩序。伊拉克与所有宣布了反对这种西方理论的立场的代表团站在一起。我们呼吁采取联合行动来应付这种理论。

我想再次提到一个1998年在伊拉克成立的权利逻辑的生动例子。当时安全理事会正在讨论对伊拉克履行根据安全理事会决议所承担的义务,特别是与裁军有关的义务的情况进行全面审查的安排,以便考虑解除自从1990年8月以来对伊拉克实行的全面制裁。当安全理事会正在开会讨论秘书长关于伊拉克在裁军方面的合作的报告时,部署在波斯湾区域的美国和英国部队从1998年12月16日至12月20日对伊拉克发动了大规模军事侵略,他们的侵略借口是理查德·巴特勒的谎言和虚构。那次侵略使大量无辜平民丧生,此外还摧毁了很多基础结构,以及很多已经受前特别委员会建立的严格监测制度的监测的工业设备。该特别委员会没有在这些遭受破坏的地点发现任何违反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情况。

尽管出现了《宪章》和本组织机制的粗暴违犯,安全理事会这个负责这种局势的主要机构仍旧完全无能为力,没有立即采取任何集体行动。对美国和英国去年12月的侵略的国际谴责没有来自安全理事会。会员国的政府和人民在一段引人注目的平静时期后在更大

的规模上进行了谴责。大会可以回顾,安全理事会当时正忙于授权专家小组评价涉及伊拉克对安全理事会决议中所规定的义务的执行情况的特殊局势,露骨的来一次争取时间。

这些小组单方面的开始其工作,没有与伊拉克政府进行任何事前磋商,也没有听取它的意见。这个过程所产生的报告反映了安全理事会的政治平衡,而这脱离了当时局势的实质。但是,这个过程达到了提交决议草案的阶段,而这些草案无视了安理会本身的决议中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事实上,那些决议草案给伊拉克增加了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中没有包括的,而伊拉克已经实施的新义务。

这些安全理事会决议在把各种义务强加伊拉克的同时,也使安全理事会负有一项具体义务。它们规定,一旦伊拉克履行这些决议中所规定的义务,就将解除对伊拉克的全面禁运。但是,在过去9年期间所发生的情况是,安理会在为审查伊拉克遵守其义务情况而举行的40次会议中未能作出决定解除全面禁运,更不要说使这种局势有哪怕是百分之一的缓和,尽管所有国家,甚至包括伊拉克的敌国——例如美利坚合众国——也表明,在不断对伊拉克进行侵略的这一困难条件和威胁下伊拉克努力履行其义务的9年后,没有解除任何重要的制裁内容。

那么,安理会为什么没有解除对伊拉克的禁运?这其中的原因是美国对安理会的霸权,这种霸权通过各种手段使安理会无法适当实施其决议。我们在过去几个月中看到安全理事会,特别是五个常任理事国竭力采取一种对伊拉克的一致立场。

符合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的正确立场是很清楚的和没有争议的。一旦法律和正义的逻辑得到遵守,伊拉克要求获其明确和合法的权利——即撤消根据安理会各项决议对它实行的制裁。这些决议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的并且由伊拉克在过去9年中加以实施。现在轮到那五个国家履行其义务。伊拉克的立场对所有人都应该是清楚的。为了得到伊拉克的同意,任何建议或决议——或他们的可能后果——都应以国际法和非选择性的作法为基础,否则,所产生的结果将遭到断然拒绝,我们将继续进行斗争以全面和最终的解除制裁,以便实现我们的所有合法要求。

通过公开、个人和官方的证言,现在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前特别委员会——这个小组令人遗憾地带着联合国的名称并在名义上代表联合国行动——被美国 and 英国用来实现他们对伊拉克人民、主权与安全的侵略目标。为了实现其主要任务的最终目标,前特别委员会在伊拉克工作时采取了两种办法:第一,为美国、英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进行间谍活动,以使他们能够实现其破坏伊拉克政治稳定和推翻其爱国政权的目标;第二,通过向安全理事会报告特别委员会尚未完成其使伊拉克解除武装的任务来保持禁运。

前特别委员会在它于伊拉克进行的工作中,使用了暧昧的方法伪造事实,并以同对伊拉克具有敌意的美国的作法相吻合的方式提出这些事实。最后一些这种事实与在巴格达该委员会总部找到的 VX 瓶子问题有关。这些样品被该委员会用来污染被送往美国实验室进行分析的失踪弹头,这是为了使美国政府能够找到支持它对伊拉克武器计划的指控的证据。该委员会的暧昧作法并不仅限于此,甚至仓促地摧毁 VX 样品,以掩盖该委员会参与美国对伊拉克的阴谋的无可否认的证据。

美国歪曲和曲解伊拉克同安全理事会之间关系的企图,并非仅限于利用前特别委员会,而是达到了公开阻挠任何缓解对伊拉克实行的全面禁运的影响的努力的最丑陋的形式,这种禁运给伊拉克人民尤其是其儿童造成悲惨的痛苦。

各种报导和实际情况都表明:伊拉克同联合国之间签署的有关以石油换食品的模式《谅解备忘录》无法满足伊拉克人民的基本人道主义需求,而在该备忘录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障碍清楚地证明了美国政府坚持伤害伊拉克人民,剥夺所有国际盟约所载的属于他们的基本人道主义权利。

值得一提的是,执行《谅解备忘录》的五个最初阶段期间运到伊拉克的物资的总价值,几乎等于为了支付特别委员会的费用、联合国在伊拉克的费用以及联合国赔偿委员会开支而从伊拉克石油出售收入中扣除的资金。自1997年起到现在运到伊拉克的物资的总价值是4 948 300 000美元,而为特别委员会、联合国的设施及赔偿委员会扣除的资金为4 041 185 000美元。

粗略地看一下这两个数字就可清楚地看出,《谅解备忘录》未能满足伊拉克人民的基本人道主义需求。美国和英国在处理有关人道主义需求的合同时使用的方法,以及在处理这些合同中的蓄意拖延,使《谅解备忘录》的主要目标变成成为联合国的费用筹措资金,而非确保伊拉克人民的基本人道主义需求并制止其人道主义和健康情况的恶化。

这还揭露了美国和英国政府使该备忘录失去人道主义内容的企图,即暂停与伊拉克人民健康状况直接有关的合同。例如,虽然为供水、卫生和电力所签署的合同价值达到3亿5千2百万美元,而迄今运到伊拉克的物资的价值只有6千4百万美元,即仅占这些合同总值的18%。英国人和美国人暂停了其余物资的运送。

伊拉克儿童由于这种不公正的全面禁运所经历痛苦的最明显的证据,就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99年8月12日的报告,其中载有关于营养不良、缺少医药和伊拉克母亲们不断恶化的经济和营养状况造成的儿童死亡率的统计数字。该报告决断地证明了对伊拉克实行的禁运是儿童死亡率大幅度增加的主要原因。

美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地歪曲有关《谅解备忘录》的事实,或利用一切有关食品和有关医疗用品分配的有偏见的谎言和指控。基于联合国部署在伊拉克全境的观察员的报告的秘书长关于伊拉克方案的报告,证明了根据《谅解备忘录》所接收的所有人道主义物资分配过程的准确性、正常性和平等性。

美利坚合众国蓄意力求维持禁运并使伊拉克人民的痛苦加倍,尽管与实行禁运有关的所有原因已经消失。美国的这一目标通过美国官员所作的很多声明而变得相当清楚,它们使禁运成为实现美国对伊拉克的敌对政治政策的工具。

美国/英国对伊拉克敌意政策的基本支柱,就是对伊拉克实行两个禁飞区,这是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违反。我们在1999年1月15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中已提到有关该情况的证据。一些常任理事国及安理会审议范围内外其他成员表示的看法也证实了这点。

众所周知,这些禁飞区的继续实行是使侵略永久化的手段,以期实现英美对伊拉克政治阴谋的目标。美国

官员毫不迟疑地表明其真正意图:利用这些每天进行的轰炸行动来实现美国政府针对伊拉克独立和主权的目目标,并破坏爱国政府的稳定。

《华盛顿邮报》1999年1月31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引用了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的话,把某次袭击描述为以无任何损失地满足所有目的的方式来取得这一目标的方法,并说如果美国要进行一场大规模行动,人民会问是什么情况引发了这种袭击。

从这一分隔侵略的政策出发,美国和英国战机一直进行每天的演习以炫耀武力,这侵犯了伊拉克的领空。它们以这种方式对伊拉克境内包括通讯站、油泵站和私人住房在内的民用和经济场所发动野蛮的轰炸行动。甚至清真寺和教堂也未幸免于这种继续进行的野蛮袭击,其中包括可追溯到公元四世纪的马尔·马蒂教堂,它于1999年8月11日遭到美英飞机的轰炸。

从1998年12月的侵略到现在,美国和英国飞机出击的总架次达到12 143,其中9 830次是从沙特和科威特领土上出发而在伊拉克南部进行的,而2 313次则是从土耳其领土上起飞而在伊拉克北部进行的。

美国政府正试图为这些每天进行的侵略行为寻找无法自圆其说的借口,数以百计的无辜平民成为这种侵略的受害者。美国政府宣称对平民的轰炸是针对伊拉克空军袭击的正当自卫。

我要提这样一个问题:美国从那里得到权利来为一个缺少任何基本合法性的行为辩解?谁给了美国侵略者按其宣称那样在伊拉克领空采取自卫行动的权利?美国政府采取的行动是对伊拉克人民展开了公开战争。这不过是一种文字游戏。一位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在1999年9月2日的《华盛顿邮报》上描述这些行动时,承认这是一种低级别的战争。

伊拉克从得到各种国际文书和公约保障的其合法自卫权利出发,将毫不犹豫地反击所有美国和英国的侵略行为,这种行为旨在侵犯我国领空和领土的完整,威胁我国及我国人民的安全。

伊拉克将继续以一切现有手段和潜力抗拒美国和英国的侵略。它不会屈服于美国的讹诈。美国对伊拉克的敌意政策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经美国政

府高级官员的正式声明而让人看清,这些声明强调美国决心推翻伊拉克爱国政府并支解其国家统一。

此外,美国最高立法机构颁布了法律,允许美国政府干涉伊拉克内政、拨出大笔款项在伊拉克境内进行恐怖主义、破坏和暗杀行为,并任命政府高级官员监督这些不道德和非法的任务。

美国的这种政策促成鼓励土耳其部队以追赶库尔德斯坦工人党分子为借口在伊拉克领土内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土耳其的这些军事行动在伊拉克北部造成了不稳定和秩序混乱,对伊拉克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构成威胁。伊拉克定期向联合国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报告土耳其这种频繁的侵略行为。这种行为违反了睦邻友好的原则,威胁到该区域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然而联合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制止这种行动,原因是很清楚的:它反映了美国旨在维持伊拉克境内非正常状况的政策。

美国持续的霸权主义和掌管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以及国际经济和政治组织命运的作法,是迄今对联合国最严重的挑战。联合国应奋起反抗这种统治,证明它恢复平衡的能力,以实现《宪章》所阐述的宗旨,主要是实现和平、安全和稳定,促进国家间的友好关系并鼓励经济合作。

在萨达姆·侯赛因总统 1999 年 1 月 17 日发表的一篇讲话中,伊拉克呼吁有关国家成立一个各种机构的大会,就各种规约和章程达成协议,以期实现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中的认真合作,从而保持平衡并实现和平,首先从亚洲及与之有关的问题开始。这个大会不会针对任何人,但却旨在按照已确立的人道主义准则保护其成员,并合法地捍卫它们的安全和利益以及国际安全。我们从这个讲坛上呼吁信奉全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享有的价值、文化、自由、独立、正义和平等的人民和国家,考虑萨达姆·侯赛因总统的建议,以期展开一次旨在把建议变为现实的对话,这将有助于在全世界实现平衡、和平与安全。此外,包括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明确呼吁建立一个多极世界,在其中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建立政治、经济和军事平衡。

联合国坚持其《宪章》所阐述的原则,在无选择性和歧视性的情况下充分和公正地执行其决议,这是它在

恢复各国对其实现正义与和平并鼓励各国遵守和执行其决议规定的能力的信任方面的信誉标准。

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应执行其有关中东的决议,主要是那些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而且应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其在巴勒斯坦自己的国土上生活的合法和不可剥夺权利的合法斗争。它还应支持他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对其领土的殖民化的斗争,以及他们在自己领土上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主权独立国家的斗争。

联合国必须执行其有关使中东成为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决议。它尤其应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687(1991)号决议的第 14 段,该段认为伊拉克的裁军是在中东建立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一个步骤。联合国迄今没有在这一方面采取任何步骤。

最后,在全世界实现正义、民主和发展的概念,取决于各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的公正的民主化。要实现这些概念,就只有对联合国、其各机构实行一系列相互关连的行政、结构和政治改革,以便它能够承担起《宪章》所规定的责任,主要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责任。

下午 1 时 50 分散会